

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基

中国人权研究会

2021年12月

次把“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1996年8月29日,克林顿总统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希望建造一座通往21世纪的桥梁,从而确保我们仍是全球具有最强大防务能力的国家,确保我们的外交政策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美国肆无忌惮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

随着“9·11”事件爆发,以及美国出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等事件的接连发生,美国已成为侵犯别国人权的主要国家。在反恐的名义下,美国司法部对国际人权法持拒绝态度,酷刑、暗杀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也是层出不穷,并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针对外国情报目标的专项行动,监听并搜集外国政要以及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事件数不胜数,一次次引起轩然大波。

二、美国人权政治化举措的深层原因与表现形态

美国对人权态度的历史演变显示,无论是早期对人权的漠视甚至拒斥,还是后期热衷于将人权作为大棒到处挥舞,本质上都是将人权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依据人权与其政治战略的契合关系来决定对人权的态度。

（一）美国将人权政治化的深层原因

美国将人权政治化的深层原因是国际人权标准与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及全球战略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冲突。其一,美国自身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种族歧视、枪支泛滥、暴力执法、两极分化等等。其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盟友按照美国自己宣布的标准也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其三,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不断发动侵略战争,非法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这些都与人权原则背道而驰。因此,美国实际上无法将自己所宣扬的人权真正付诸实施,更谈不上与国际人权标准保持一致。当国际社会在各国的共同推动下将人权作为全球治理的共同道德标准时,美国为了增强自己的“软实力”不得不顺应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将人权旗帜为己所用,装扮和掩饰自身侵犯人权的行径。但是国际人权标准与美国全球战略之间的根本矛盾是无法消除的,由此导致美国必然选择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来使用人权原则。

（二）美国将人权政治化的三种形态

面对其全球战略与国际人权标准之间的冲突,美国或是放弃人权原则,赤裸裸地维护霸权;或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有选择性地适用人权原则;或是直接将人权作为借口,对威胁自己政治利益的国家扣上“侵犯人权”的帽子,为侵犯他国主权披上道德外衣。

- 1.图谋政治利益抛弃基本人权理念**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杜勒斯主义”树立了这样的理念:同苏联竞争,就是对人权作贡献。杜勒斯主义主张把联合国作为谴责共产主义对手的最好讲坛,艾森豪威尔政府用“道德反共主义”代替对国际上公认人权的关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则把反共置于优先地位,人权问题只放在第三位。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部长的罗伯特·盖茨曾经写道,“卡特政府以任何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向苏联发起了意识形态战争”,具体办法就是“攻击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全力支持苏联国内的不同政见者。

2.区分政治敌友双标适用人权准则

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和处理人权事务时,并不是按照统一的国际人权标准,从公正、客观的角度关注人权保障,而是采取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

首先,对自己国家的人权问题奉行一套标准,对别国的国家的人权问题奉行另外一套标准。尽管美国国内长期存在大量失业、贫困、无家可归、枪支泛滥、暴力犯罪、种族歧视、移民人权等系统性人权问题,然而美国在其每年的别国人权报告中却对这些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一味趾高气扬地指责别国的所谓人权问题。

其次,对自己的盟国或友好国家奉行一套标准,对自己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或利益相冲突的国家则奉行另一套标准。里根政府在提交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规定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人权标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适用“积极的”人权标准,对它们侵犯人权的行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而对美国的盟国,即使存在侵犯人权现象,最多也只采取“消极的”人权标准。在美国每年发表的别国人权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他“不友好”国家的人权问题夸张渲染,但对其盟友的人权问题则轻描淡写或遮遮掩掩。

第三,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人权标准。如果某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利益,“人权问题”就可以被利用来指责、要挟和制裁该国;当该国迎合了美国政府的利益时,“人权问题”则可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而改用激励方法。

第四,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对人权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一段时期,美国始终对人权持冷淡态度。直到后来,特别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联合国难民署的材料显示建立难民国际制度将是东西方斗争中的一个有力武器,美国才转而采取支持立场。

第五,对不同类权利采取不同态度。美国从自身经济和政治体制出发,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采取不同态度,对自由权与生存权、发展权采取不同态度,突出强调前者而淡化甚至否认后者。

无论这种选择性和双重标准有多少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使人权服从服务于美国的世界霸权 and 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需要。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公开宣称的:人权“是促进共产党国家逐步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选择,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

的进程”。

3.挥舞人权大棒侵犯他国主权

美国将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与人权外交手段相结合,以实现其人权外交目的。一方面,美国将人权与经济援助挂钩,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也必须同时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抵制美国人权外交的国家,则结合武力行动以实现人权外交目的。

美国历届政府都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防止亚太地区出现有损美国霸权的大国作为其战略核心。中国由于现实原因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目标,而“人权”则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指出,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对华遏制的一派时至今日坚持认为,人权是针对中国的最后一个意识形态武器,是让中国共产党无法生存下去的一个项目。“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2000年,美国国会成立了美国“国会一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集中体现参众两院、政府国家安全机构、商业集团和人权组织的共同利益。这个委员会监控中国各个方面的人权状况。

詹姆斯·派克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材料得出结论:美国官方所倡导的所谓人权与真正的人权理念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美国官方高举人权旗帜,其唯一的目的还是利用人权推广自己的全球战略。美国政府逐步把人权变成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种话语权,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的工具。

三、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严重危害全球人权善治

美国将人权政治化,对全球人权治理带来灾难性影响,阻碍了国际人权事业的正常发展,导致一些国家陷入混乱,玷污了人权的概念和神圣理想。

首先,美国的人权政治化行径阻碍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美国以政治利益划界,阻塞了不同人权观点之间正常对话的可能性,将联合国人权机构变为政治对抗的战场。这不仅影响了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莫恩等学者认为,由于美国那些善于玩弄实力政治的政客们对人权问题根本不屑一顾,20世纪40年代所谓的人权革命“夭折于诞生之时”。众多学者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人权问题陷入“死胡同”,是因为美国在冷战政治中未能积极参与对人权问题的国际行动。

其次,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国家动荡,产生新的人权灾难。美国侵犯他国主权,导致被干涉和侵略国家战火纷飞、生灵涂炭,造成了新的人权灾难。美国学者崔升焕和詹姆斯·帕特里克指出,美国向国际社会单方面输出自己人权价值观有四种常见的政策工具:一是军事干涉,如在伊拉克或科索沃,美国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态恶化为借口而发动战争;二是军事援助,以消除人权危机为由,美国政府将武器提供给特定派系的武装分子;三是经济制裁,最典型的是认定所谓“流氓国家”,号召其盟友一起切断与该国的经济往来;四是经济援助,这种工具被广泛运用在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之中,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要求这些国家依照美国的标准改善人权水平。两位学者在对近30年内14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二战后,美国基于外交的人权输出几乎全是失败的,无论是军事干涉伊拉克,还是经济援助拉美国家,至今都未能使那里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这表明,美国将人权战略工具化,非但不能真正地改善人权,反而会导致新的人权灾难。

最后,美国将人权作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工具,玷污全球人权崇高的理想。美国大搞双重标准,漠视甚至纵容真正侵犯人权的行径,而且对保护人权的政策措施口诛笔伐甚至实施经济制裁、政治施压或军事威慑。这使得人类长期追求的人权理想被严重玷污,人权概念成美国侵犯他国人权者的借口和工具。正如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昭璐指出:“它们提倡的‘人权’,实际上是一根政治大棒,基本上是用来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合法政府的工具,是一种‘政治化’的手段和策略,并非是对人权的本质尊重。在世界各地,凡是有动乱的地方,都能听到它们‘保护人权’的口号,在这些国家混乱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叛国分子时,也都能看到西方世界的‘人权大棒’。说到底,它们就是在将人权‘政治化’,完全是别有用心。从本质上说,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是在实质上并不尊重人权的表现。”

美国的人权政治化行径侵蚀和毁损全球人权善治的基础,给全球人权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受到了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普遍谴责和广泛声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2021年10月7日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指出,美国等少数国家执意在联大三委挑起对抗,点名批评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各种帽子满天飞,却对自己和盟友国家的人权劣迹视而不见。美国等少数国家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借人权干涉中国内政。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严正拒绝。埃及、阿尔及利亚、乍得、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在发言中强调,各国人民有权根据国情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搞双重标准,反对干涉内政。

美国将人权政治化所导致的恶果使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人权非政治化是全球人权治理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前提,防止和遏制人权政治化,是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逆历史潮流而动,变本加厉推行人权政治化,破坏全球人权事业的健康肌体,将一个又一个国家推入社会动荡的漩涡。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认清其“人权卫士”面具之下的真面目,反对美国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卑劣行径,这将使美国竭尽全力维护的国际霸权遭到全面反噬,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的凯歌声中鸣响起美国霸权衰落的丧钟。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近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公布2020—2021“年报”显示,来自澳大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国家政府以及军工业的经费占到了该智库总预算的87%,美国国务院更是其海外经费最大的来源。该研究所一直标榜为“独立智库”“学术研究机构”,但实际上长期受金主指使和操控,炮制了大量臭名昭著的涉疆、涉华谎言和虚假信息。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当时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国防部为该智库每年提供400万澳元(1美元约合1.39澳元),资助期至2022—2023财年。这份“年报”详细表明,在该智库总计1000余万澳元年度收益中,37.5%的经费来自澳国防部,24.5%来自澳政府其他部门,4.2%来自澳地方政府,3.0%来自国内外军工业,18.3%来自外国政府机构。其中,美国国务院提供的两笔费用合计约158万澳元,占该智库2020—2021年度海外政府经费的80%。

在一笔高达98万澳元的经费中,美国国务院要求该研究所在中国新疆事务、中国人权、科技及海外影响力等方面设置议题,丑化中国。在另一笔近60万澳元的经费中,美国国务院要求该研究所对中国的人才计划、社交网络舆论和科技产业等设置

抹黑性议题。

事实上,为了金主的利益,该研究所多年来热衷于炒作各种反华议题,

「披着学术外衣的反华急先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长期炮制谎言和虚假信息

四处散布谣言,丑化、妖魔化中国,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反华急先锋”。此前,该智库出版的一些污蔑中国的“研究成果”已多次被证明是虚假报道。例如,其声称新疆存在的“拘留中心”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办公大楼、物流园区和学校等建筑,其所建立的“新疆数据项目”得到了美有关政府部门和反华组织“人权观察”的资助和支持。日前,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频频在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的闹剧中出镜“作证”、表演政治闹剧,更是遭到多方揭露和批评。

澳大利亚亚太新闻网总编辑马库斯指出,该研究所鼓吹自身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反华游说组织,成年累月渲染中国“威胁”。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发表文章指出,当前,澳政府给外界的印象是将澳中日常双边关系管理转变为“生存之争”,其背后推手就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该机构受美国资助,对中国的评论“越来越血腥”。澳工商委员会北领地分会主席戴若·顾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澳战略政策研究所为代表的智库为了其金主利益长期妖魔化中国,加深了澳民众的仇外心理,严重阻碍澳中

关系发展。澳大利亚前外交官约翰·梅纳德表示,澳战略政策研究所“缺少诚信,让澳大利亚蒙羞”。

（本报堪培拉12月27日电）

英欧“北爱尔兰议定书”谈判进展迟缓

本报记者 郑彬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近日发表声明说,在“北爱尔兰议定书”实施问题上未见英国方面的诚意。如果双方就“北爱尔兰议定书”重新谈判,这将会导致北爱尔兰局势不稳定,并严重影响欧盟与英国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后,双方围绕渔业、司法等问题龃龉不断,而其中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北爱尔兰贸易地位问题。根据此前达成的“北爱尔兰议定书”,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内,避免与爱尔兰之间出现“硬边界”。这客观上导致从英国其他地区进入北爱尔兰的商品需经过海关检查。英国因不满由此造成的国内贸易不畅,一直没有完全履约。

今年夏天以来,英欧双方围绕食品出口的争端迅速扩大,英国国内要求重新谈判议定书内容的呼声不断高涨。英国希望取消大部分从本土进入北爱尔兰商品的边检,并废除欧洲法院对议定书的最终仲裁权。由于担心英方可能会不断提出更多其他要求,欧盟拒绝修改议定书内容,要求在原有框架下寻找解决方案,包括降低检查频率及简化相关程序等,但未被英方接受。

英国国务大臣弗罗斯特近日发出警告称,如果谈判最终无法取得突破,英方将考虑单方面暂停议定书的执行。对此欧方表示,英国如果一意孤行将面临严重后果。爱尔兰政府也表示,欧盟可能会考虑采取激烈的反制

措施,包括放弃整个“脱欧”协议。英国剑桥大学欧盟法专家伯纳德表示,一旦欧盟终止双边贸易与合作协议,英国将被迫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与欧盟进行贸易,这将使英国陷入事实上“无协议脱欧”的不利境地。此外,欧盟还可能选择其他反制措施,包括对英国进口商品进行更严格的检查以及加征关税等。

与此同时,英国企业界代表督促政府不要撕毁与欧盟达成的相关协定,否则英国出口将遭受严重打击,进而影响供应链安全和投资稳定性。英国肉类加工商协会负责人艾伦表示,英欧贸易战一旦爆发,将对英国整个食品行业带来毁灭性打击。英国道路运输协会负责人麦克肯奇则表示,如果谈判破裂,欧盟将在边境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措施,这将导致运输效率严重下降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物流业带来负面影响,使本已紧张的供应链遭受更大压力。

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的研究显示,受供应链瓶颈以及“脱欧”影响,英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陷入长期滞胀的风险正在增加。2022年,英国通胀率或将达到5%。2023年,英国经济增速将从4.7%下滑至1.7%。另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长期来看,“脱欧”将使英国经济总量下降4%,远超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随着疫情因素的逐渐减退,“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

（本报布鲁塞尔12月27日电）

法国出台计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

本报记者 刘玲玲

法国政府近期出台推进“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新计划,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22亿欧元用于加快人工智能发展,重点资助这一前沿领域的培训和研究。

法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由总统马克龙于2018年3月发布,内容包括吸引高质量研究人员、建立国际水平研究中心、加强人才培养等。按照该战略,从2018年起,5年内政府将投入15亿欧元发展人工智能,用于鼓励科研创新项目、工业项目及初创企业,其中4亿欧元用于科研项目招标和重大

创新研究,8亿欧元用于纳米电子学。新计划将在原先基础上追加投资22亿欧元,并列出了3个主要目标:提高法国人工智能竞争力,使法国成为嵌入式人工智能和可信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加快人工智能在经济领域

本版责编:邹志鹏 陈一鸣 曹帅韵